

· 笔 谈 ·

## 抗日战争研究如何推进(续)

**编者按:**本期我们继续推出 15 位中外学者的笔谈,各位学者的题目自由确定,除了中国学者的议论之外,我们也特别想听听外国学者的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是反对的意见我们也该听听,读者当然也会明辨,不需我们提醒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国际型的战争,我们需要更为宽广的视角和胸怀。

本期笔谈依然按中外作者各自的汉字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 两岸如何共同书写抗战历史

刘维开

2015 年是抗战胜利 70 周年,台湾方面由“国史馆”主编、出版了一套《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全书分《和战抉择》《军事作战》《全民抗战》《战时社会》《对外关系》《战后中国》六编,以较为全面的范畴与视角,论述抗日战争的历史,应该也是去年海内外唯一一套完整论述抗战相关史事的学术论著。

“国史馆”于 2013 年开始该书的编撰工作,鉴于既有的抗战史著出版已有相当时间,且受时代影响,大多具有特定观点,如今新史料大量出现,加上社会日渐开放,可以接纳与以往不尽相同的观点,遂决定集合众人力量,撰写一部较为全面,而且不具有意识形态的抗战史论著。全书结合 50 多位台湾方面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及“国史馆”同仁,经过三年的时间,于 2015 年 7 月正式出版。台湾方面的抗战史研究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部分,全书各章、节作者均为该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如笔者长期以来的研究主题为战前建设以及民国政治制度,即负责撰写第一编《和战抉择》的“国民政府的备战”及第三编《全民抗战》的“从训政到宪政”两章,因此该套书亦可视为现阶段台湾方面研究抗战历史的学术成果。

该书取名“新编”,目的希望突破旧有的思维窠臼、解释框架以及所有禁忌和限制,而有新的立论格局和新的撰述方向。主编吕芳上对于该书在学术上的意义,称:“我们当可傲视于史学界的是:我们探讨历史,从史料出发,就史论史,无视伟人教条、党派意识形态,更不理睬非理性的政治框架,而回到学术本位,讨论‘人’的活动的历史。”<sup>①</sup>对于该书在抗战史研究的位置,则称:“《中国抗

<sup>①</sup> 吕芳上:《〈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序》,吕芳上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和战抉择》,台北,“国史馆”2015 年版,第 vi 页。

日战争史新编》想要呈现的不是一部单纯叙述战争的历史,而抗日战争也不是一场已经走入历史的战争,至今仍有许多国家和个人受其影响,而且敌对双方对战争本身的看法和战争遗留的问题,意见不一,在烟硝未戢的情形下,抗战史也因此会被不断地研究讨论、重新撰写。《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不求历久弥新,但冀盼能成为:过去历史的纪录与时代的见证、现在与国内外学界对话和交流的平台,以及未来更多新研究、新著作的踏脚石。”<sup>①</sup>就该书内容而言,确实超越传统的军事史、政治史、外交史的论述模式,而扩及社会、文化、宗教、民族等层面。观点上亦摆脱以往狭隘的民族主义本位、国共斗争立场及道德史观,从客观性及宽容性较高的国际角度加以研讨。不过诚如吕芳上所指出,“由于基础资料的不足及相关研究的未臻成熟”<sup>②</sup>,还有不少重要面相未能纳入该书范畴或未予深入讨论。例如:战争与现代性、大后方的整体研究、战时的区域研究、战时的人物类群、战后国共与美苏等国的关系、战后的去战争化和去殖民化等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索,而这些议题也应该是台湾方面研究者日后可以开发或着力的范围。

## 二

台湾方面的抗战史研究开始较早,且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重点,史料汇编、专书、论文不断出现。史料汇编如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主编的《革命文献》,自第五十八辑起,以抗战时期之教育、学术、高等教育、青年运动为内容,连续编辑了六辑抗战时期教育文化史料专辑,第九十六辑起,再以“抗战建国史料”为题,编辑“社会建设”“田赋征实”“粮政方面”等专辑,另有“卢沟桥事变史料”及“日军在华暴行——南京大屠杀”各两册;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分为“绪编”“作战经过”“战时外交”“战时建设”“中共活动真相”“傀儡组织”“战后中国”等七编二十六册;“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出版《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分为《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外交关系》《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犯上海与进攻华北》《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日本制造伪组织与国联的制裁侵略》《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金山和约与中日和约的关系》《中华民国对日和约》等九册。专书如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下两册,于1973年5月出版,为通论抗日战争历史之专著;战史以“国防部”史政局编印《抗日战史》最为全面,共101册,涵括抗日战争历次战役;其他如张其昀、魏汝霖编《抗日战史》(国防研究院出版),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黎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三军大学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四部“抗日”(“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出版)等。此外,海军、空军因作战性质不同,各有其抗日战史,包括《海军抗日战史》《空军抗日战史》《防空抗日战史》,均依原始资料编辑而成。2015年海军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重新汇整相关史料,编辑《海军抗战期间作战经过汇编》一册。论文方面,主题涉及层面甚广,不再列举。

对于抗战历史已有的相关研究,除了前节所列几个面相外,沦陷区的研究在抗战史研究中相对而言是薄弱的。对于沦陷区城市史有相当研究的学者巫仁恕曾表示,抗战史研究大部分的焦点仍然是以“抗敌”的层面为主,“长期以来学者的注意力较少拓展到抗敌活动以外的讨论;当时几乎占中国领土三分之一、拥有人口一半以上的广大沦陷区因此被学者忽略”<sup>③</sup>,近几年虽然有加强的趋势,除了汪兆铭伪政权因“国史馆”公布《汪兆铭史料》而受到关注外,比较研究是另一个重点,如

① 吕芳上:《〈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序》,吕芳上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和战抉择》,第vi页。

② 吕芳上:《〈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序》,吕芳上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和战抉择》,第v页。

③ 巫仁恕:《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城市生活——以苏州菜馆业的兴衰为例》,《新史学》第25卷第4期,2014年12月,第166页。

“满洲国”政权与汪兆铭伪政权的比较研究,或者同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与朝鲜的比较研究等,但是就沦陷区本身仍然有相当多值得研究的议题。

除此之外,在传统的抗战史研究中,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还有没有发展的空间?笔者曾经与研究抗战军事的学生谈过这个问题,对他而言,对抗战的理解主要来自于资料,有资料就有可以研究的题材,他的回答应该可以作为抗战军事研究的参考。首先,他认为抗战的主体是战争。过去关于战争,军方以战史为主的著作很多,但很少有研究者认真去与军方的说法对话,这应该是可以发展的方向。其次,军事方面的相关著作以往大多集中于战役过程的叙述,机构的研究却很欠缺。战时重要机构如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军令部、军法执行总监、各行营、各战区等,都扮演重要角色,相关研究却很少。再次,军事所包罗的层面不只是战争过程,人事、情报、训练、后勤都很重要。确如这位学生所说,以往军方的战史与学界的研究几乎没有对话的空间。其实军方的战史研究也有值得参考的地方。2014年9月,15位具有军方背景的战略研究者从军事专业角度,剖析抗战的战略以及若干个主要战役,撰写了17篇论文,汇集为《抗日战争是怎么打赢的》一书,引起学界的关注。近几年,学界也有研究者如苏圣雄,爬梳相关档案,重新参阅军方出版的战史,进行淞沪会战、徐州会战的研究,寻求与军方研究者的对话。再如近几年随着“国史馆”、档案管理局关于戴笠与军统相关档案的公布,对抗战时期情报工作的研究有了大幅进展。后勤研究亦是如此,早期有《国军后勤史》等通论性著作,近年来随着资料的开放,有较多的议题出现,如杨善尧、皮国立等即以抗战时期军医或伤兵治疗为主题,撰写论文、出版专著。

### 三

对于近期大陆方面提出抗战历史“共享史料、共写史书”的议题,笔者认为十分正确且具有前瞻性,但是就现阶段来看,并不是件容易进行的工作。

在共享史料方面,自1987年以来,两岸研究者相互至对方档案机构参阅资料,已经是很正常的事。目前台湾方面,除了档案管理局因为法令规定,限制大陆及港、澳地区人士阅览外,其他如“国史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等,几乎每天都有大陆研究者前往申请调阅相关档案。档案管理局虽然限制大陆及港、澳研究者阅览,但是仍然有部分研究者透过第三者,取得所需要的研究资料。反观大陆方面,至目前为止,仍有少数档案馆连大陆研究者都难以进入阅览档案,遑论台湾地区或其他国家、地区的研究者。因此就“共享史料”而言,台湾方面并不是问题,大陆的档案开放与学者的需求还有距离。相关档案馆的政策不调整,这种不对等的史料开放现状不改变,所谓“共享史料”可能不易实现。

至于“共写史书”,就笔者个人的意见,比“共享史料”更困难。抗战胜利已经超过70年,卢沟桥事变即全面抗战爆发即将80周年,但是海峡两岸对于抗战历史的论述仍然存在若干差异,这种差异并非来自于对抗战本身的陈述,而是各自阵营在抗日战争中的角色认定。台湾方面,一贯主张中华民国政府为对日抗战的领导者,自然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以及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为抗日战争历史论述的主轴;大陆方面,在1949年10月建政后,中共将抗日战争视为其建党、建国历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强调在抗战期间的“中流砥柱”作用,甚至在一段时间,完全忽视蒋中正、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近30年,大陆官方对于抗战历史的论述逐渐有所调整,但是对于中共在抗战期间作为的评价,两岸仍有较大的分歧。如何能改变或调整双方论述上的差异,是政治问题,而非学术问题。如果就学术问题来看,两岸合写民国史早有前例,最近的例证就是由中研院院士张玉法与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张宪文共同主持,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中华民国专题史》。全书18卷,共有70位中国大陆及港澳台的研究者参与撰稿。其中第11卷《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由张瑞德、杨维真、齐春风及笔者四人负责,章节安排除绪论、结论外,分为九章:“战前十年的国民政府体制及其运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战场”“抗战时期的中国国民党”“政府机构的调整”“军事体制”“战时财政”“征兵”“征粮”,其中“征兵”“征粮”两章,分别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征兵工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粮食征购”两节。全书就学术论学术,包括审查意见在内,彼此没有太多的歧见。再以笔者所参与“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为例,每两年举办一次,至今已召开了五届。长达10年的历史,从早先会议时两岸研究者间的对立争执,到目前的彼此理解,亦可说明在学术方面,两岸合作进行抗战史研究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不以学术为导向,一旦涉及政治层面,即难以进行讨论。

长期以来,两岸在抗日战争史研究方面各自有相当成果,且有若干研究在学术观点上具有一致性。如何能整合两岸抗战史研究一致性的观点,避免或化解彼此的歧见,是在进行两岸关于抗战史“共写史书”前应该考虑的问题。如果能以“国史馆”编辑《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的初衷作为依据,去异存同,或许是种可行的方式。

[作者刘维开,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郭蕾)

## 抗战史研究“三调”

江 沛

以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为契机的宣传热潮逐渐散去,各地抓住机会兴建了一批抗战纪念馆,树立了一批抗战名人塑像,出版了一批各类史料,发表了大批研究论著,召开了各个层次的学术会议和纪念会、座谈会,抗战史研究从以往由批评日本无视历史的激情和相对清淡的学术探讨共同构建的复杂层面,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需求、外交需求及弘扬民族精神的高度,抗日战争胜利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间的复杂关系得到公认,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再次得到极好诠释。

针对抗战史研究的新态势及相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战史的诸多细节尚需考察,应回到“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的状态,“把历史的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发掘出抗战与中华民族崛起、中国政治格局变革、冷战局面下中国国际环境变化间的深刻意义及影响,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与启示。对此,已获不少成就的抗战史学界,的确应该予以深刻体会,不仅要努力发掘、利用并对比各方史料,还原历史真相,思考抗战史实如何重建、史料基础如何夯实、经历者如何贡献客观记忆的问题,还要关注如何从全球史的角度关注抗战与东南亚各国间关系、从国际化视野分析中国抗战与二战时期欧美各国间外交及战略利益博弈的问题;日本是中日战争的发起者,也是战场的主导者,那么如何从日文资料中把握日本外交与政治动向、日军战略方针与战场走向的关系应是关键,从军事学的角度思考中日双方的军事体制、兵力部署、战术结构及战役特征,同样不可缺少;在充分认识战时国统区、中共根据地及日伪占领区三者关系及其影响的前提下,既要关注国统区、根据地民众的抗战动员及经济生活,也要下功